

·调查与思考·

# 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人 心理福利的影响\*

——基于安徽省的纵贯调查

宋璐 李亮 李树茁

**【摘要】**文章利用“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纵贯调查数据构建个体增长模型,研究样本地区成年子女迁移对老年人心理福利发展轨迹的影响。结果显示,成年子女迁移对其老年父母的心理福利有消极影响,而有子女在本地会起保护作用,这支持了应激—健康后果框架对迁移的主观福利后果的假设。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子女迁移对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影响依赖于年龄和队列效应,老年人心理福利随年龄增长呈非线性发展;在高龄阶段,有子女迁移、特别是全部子女均迁移的老年人比无子女迁移的老年人心理福利水平下降更快,子女迁移状况不同的老年人的心理福利发展轨迹具有明显的年龄分层模式。

**【关键词】**心理福利 迁移 农村老年人 年龄 队列

**【作者】**宋璐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李亮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李树茁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

##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中国农村老年人长期缺乏社会和医疗保障,子女是其养老支持的主要提供者,大规模的城乡迁移造成成年子女与其老年父母的分离增多,可能破坏这种养老安排,并影响到农村地区留守老人的福利状况。关于子女迁移对老年父母福利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第一种是现代化和脆弱性假设(Aboderin, 2004; Greenwell 等, 1997),认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造成家庭结构从扩展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家庭空间分离、家庭功能(包括养老支持)弱化,以及老年人地位和作用的下降。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被外出子女“遗弃”在农村(Aboderin, 2004)。第二种是新经济迁移理论,认为迁移并不只是个体的经济理性行为,而是

\* 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村老年人与子女、孙子女代际关系追踪研究”(项目编号:14CRK003)的阶段性成果。

迁移者和留守者获得家庭最优收益、分散风险的家庭经济策略,使迁移和未迁移成员都获益(Castles, 1998; Massey 等, 1997; Stark 等, 1985)。由于亚洲文化强调家庭集体主义和孝顺观念,现代化、工业化和人口迁移不可能完全破坏养老支持体系(Knodel 等, 2007; Secondi, 1997)。

目前对于子女迁移如何影响老年人心理福利的研究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1)相对于经济福利,迁移主观福利后果研究一直被忽略。已有关于迁移影响后果的研究大都强调迁移对个体和家庭收入和物质上的回报,主要集中在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经济福利、代际交换等社会和经济福利的影响(宋璐、李树茁, 2008; Knodel 等, 2007; Qin 等, 2008)。(2)未考虑主观福利后果的特殊性。通常农村留守老人的经济境况并不比与家庭成员同住的老人差,但前者失落、孤独、抑郁和被遗弃的感觉增多(杜鹃等, 2004; 张春林等, 2013; Baldock, 2000; Biao, 2006; Miliades, 2002),迁移的经济后果模型无法明确解释迁移的主观福利后果。(3)数据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健康福利的变化通常是逐步的、相互作用的和累积的过程,但已有的关于子女迁移对老年父母影响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截面数据(杜鹃等, 2004; Knodel 等, 2007),很少考虑个体变化率的差异。本文拟利用12年的纵贯调查数据,分析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人心理福利变化的影响,并尝试应用应激—健康后果框架对迁移主观福利后果进行理论解释。

## 二、研究假设和研究模型

### (一) 研究假设

Holmes 等(1967)通过研究应激性的生活事件对健康后果的影响发展出应激—健康后果框架。目前已有大量理论和研究解释了生活事件与应激源对个体的心理福利有负向影响(Kaplan, 1996)。子女迁移是可能对老年人心理福利造成消极影响的生活事件,成为影响个人社会角色和身份的应激源。而且这一应激源对不同个体造成的应激反应不同,也就是说,老年父母特征和需求、迁移子女特征和当地养老文化与应激源相互作用会造成不同的心理压力水平,本地有子女养老可能会对迁移的健康福利后果有保护作用。因此,考虑到老年人心理福利的特殊性,我们应用应激—健康后果框架研究子女迁移对留守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影响机制。我们假设子女迁移作为压力事件对老年父母的心理福利有消极影响。假设1:全部子女迁移的老年人比没有子女迁移的老年人心理福利更差。假设2:全部子女迁移的老年人比部分子女迁移(有本地子女)的老年人心理福利更差。

基于应激—健康后果框架,子女迁移作为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应激源对老年人造成的压力可能在子女迁移之后长期存在,心理福利的变化往往不会突然发生,而是逐步累积的过程。有研究发现,年龄与心理健康直接相关(梁樱, 2013)。年龄—心理问题模式一般表现为青年群体有较高的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发生率,中年以后逐渐降低,60岁之后某些心理问题(如抑郁)又有上升的趋势;而控制其他风险因素后,高龄老人的抑郁症状更少(Blazer 等, 1991)。我们假设老年阶段的心理福利呈非线性变化,且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健康状况更

差,对子女的依赖性更强,子女迁移对老年人福利造成的影响也更大。假设3:老年人的心理福利随年龄增长呈非线性下降。假设4:有子女迁移、特别是全部子女迁移的老年人的心理福利随年龄增长下降更快。

## (二) 模型建立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应从生命历程的角度关注心理福利发展轨迹而非单一时点的水平。因此,本研究利用纵贯数据,采用多水平模型的个体增长模型(Raudenbush等,2007)估计个体内和个体间心理福利发展轨迹,分析子女迁移对老年人心理福利的纵向影响。

模型的第一层考察老年人心理福利个体间发展趋势的差异,第二层描述个体内发展趋势的差异。我们假设老年人心理福利呈非线性变化,因此在层1模型加入了年龄、年龄平方和年龄与子女迁移的交互项。由于年龄平方与子女迁移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因此在建模中没有包括年龄平方与子女迁移的交互项。针对个体间变异建立的层2模型,分别对层1模型的截距 $\beta_{0i}$ 和线性时间变化斜率 $\beta_{1i}$ 进行估计。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也对年龄平方的斜率 $\beta_{2i}$ 的随机效应进行了估计,但由于结果不显著没有纳入模型。层1模型还加入了随时间变动的解释变量,包括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居住安排和代际支持等,在层2模型中则引入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两个不随时间变动的个体特征变量来解释层1模型的参数。由于本研究关注老年人心理福利发展轨迹的年龄和队列效应,因此在层2模型中引入队列变量对层1模型的截距 $\beta_{0i}$ 和线性时间变化斜率 $\beta_{1i}$ 进行解释。同样,我们也尝试对年龄平方的队列效应进行估计,但因结果不显著而未纳入模型。本研究构建的模型为:

$$\text{层 1: } CESD_{it} / LS_{it} = \beta_{0i} + \beta_{1i}(Age_{it} - 60) + \beta_{2i}(Age_{it} - 60)^2 + \beta_{3i} Outmigration + \beta_{4i}(Age_{it} - 60) \times Outmigration + e_{it} \quad (1)$$

$$\text{层 2: } \beta_{0i} = \gamma_{00} + \gamma_{01} Cohort + \gamma_{02} Sex + \gamma_{03} Edu + \mu_{0i} \quad (2)$$

$$\beta_{1i} = \gamma_{10} + \gamma_{11} Cohort + \mu_{1i} \quad (3)$$

此外,层2模型还包括: $\beta_{2i} = \gamma_{20}$ ;  $\beta_{3i} = \gamma_{30}$ ;  $\beta_{4i} = \gamma_{40}$ 。

式(1)中 $CESD_{it} / LS_{it}$ 表示个体 $i$ 在时间 $t$ 的抑郁/生活满意度水平, $Age$ 表示年龄, $Outmigration$ 表示子女迁移状况,将年龄减去60以使截距 $\beta_{0i}$ 的解释具有实际意义。层2的公式中, $Cohort$ 表示队列, $Sex$ 表示性别, $Edu$ 表示受教育程度。为简化公式,公式(1)中未显示加入层1的其他控制变量。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我们首先加入年龄和年龄平方两个时间变量,建立年龄效应模型以考察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发展变异;其次加入子女迁移变量,建立迁移效应模型分析子女迁移对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影响作用;最后加入年龄与迁移的交互变量、队列和其他控制变量建立交互效应模型,考察队列对模型截距和变化率的解释作用,以及年龄与子女迁移交互效应对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影响。

##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巢湖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

活福利状况”纵贯调查。巢湖位于安徽省中部,是典型的农业地区,由于巢湖外出务工历史较早,规模较大,使其人口老龄化程度更为严重,因此选择60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为研究对象,纵贯调查的样本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研究中使用的面板数据是根据老年人和子女的各种关键特征进行调整后的匹配结果。将2003、2006、2009、2012年跟踪调查与2001年基期调查数据进行匹配,老年人的匹配率达95.08%,说明数据的前后一致性较好。

表1 2001~2012年纵贯调查样本数量 个

调查期	时间 (年)	抽样 样本量	死亡 样本量	迁移 样本量	拒访或 失访量	有效 样本量
第一期	2001	1800	—	—	85	1715
第二期	2003	1715	240	76	8	1391
第三期	2006	1391	236	57	31	1067
第四期	2009	1067	173	33	25	836
第五期	2012	836	181	36	14	605

## (二) 变量说明

1. 因变量。借鉴国外老年人心理福利的研究,我们将老年人的心理福利分为负向维度(抑郁)和正向维度(生活满意度)(Silverstein等,2006),前者测量心理福利的负向情绪,后者评价个

体感知的当前生活质量状况。抑郁状况的测量采用CES-D量表(Radloff,1977),量表共有9个问题,3项代表积极情感,2项代表消极情感,2项表示边缘化的感受,2项代表身体症状,分“没有、有时、经常”三级测量,将积极情感问题方向调整后各问题得分相加(9~27分),得分越高代表抑郁程度越高。量表Alpha系数为0.78。生活满意度采用Diener等(1985)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来测量,量表包括8个问题,采用“是、不是”二级测量。将各题分数正向累加得到生活满意度得分(8~16分),得分越高代表生活满意度越好。量表Alpha系数为0.79。

2. 自变量。参照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对常住人口的界定,我们将迁移子女定义为与其老年父母居住地不在同一乡镇的子女。根据老年人有无迁移子女的状况分为无迁移子女、部分子女迁移、全部子女迁移三类。

3. 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出生队列、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功能状况、居住安排和代际支持。年龄为老年人在各调查年份的周岁年龄。出生队列赋值为:0=1937~1941年;1=1932~1936年;2=1927~1931年;3=1922~1926年;4=1917~1921年;5=1912~1916年。婚姻状况划分为有无配偶。受教育程度划分为是否上过学。采用Katz量表对日常生活能力(PADL)进行测量,包括洗澡、穿衣、下床或从椅子上站起、房间内走动、上厕所、吃饭(Katz等,1963)。居住安排状况分为“独自居住或与配偶居住”和“与子女(包括孙子女)共同居住”两类。代际支持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其中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采用两级测量,“没有”赋值0,“有”赋值1。情感支持通过以下问题测量:“您觉得和这个孩子感情亲近吗?”“您觉得自己和这个孩子相处的好吗?”“当您跟这个孩子讲自己的心事或困难时,您觉得他(她)愿意听吗?”。答案采用三级测量。由于亲密程度均值比总量更能代表代际关系的质量,本研究将子女与老人亲密程度均值作为代际间双向情感交流水平指标(见表2)。

表 2 2001~2012 年各调查期变量基本情况

%

	2001 年	2003 年	2006 年	2009 年	2012 年	“人一年”总样本
因变量						
抑郁得分	15.43(3.91)	15.25(4.01)	15.82(3.99)	15.56(3.81)	15.66(3.82)	15.50(3.93)
生活满意度得分	13.04(2.04)	13.18(2.24)	13.01(2.21)	12.83(2.62)	13.15(2.26)	13.05(2.24)
层1 变量						
年龄(岁)	71.51(7.36)	72.79(6.99)	74.82(6.60)	76.92(6.20)	78.81(5.80)	74.02(7.24)
子女迁移						
无子女迁移	18.18	15.84	17.03	17.65	13.64	16.81
部分子女迁移	68.57	69.07	66.34	64.97	64.86	67.35
全部子女迁移	13.25	15.09	16.63	17.39	21.50	15.84
有配偶	56.41	55.03	52.25	52.42	48.43	53.84
功能状况得分	16.84(2.34)	16.75(2.57)	16.35(2.74)	16.95(2.53)	16.74(2.61)	16.73(2.54)
与子女同住	33.86	30.18	34.44	26.67	25.52	31.13
获得经济支持	97.20	97.07	96.38	92.94	91.78	95.82
提供经济支持	41.52	36.19	14.68	23.14	16.78	29.76
获得生活照料	57.20	44.74	42.37	37.78	29.90	45.54
提供生活照料	44.32	43.54	44.52	45.88	22.90	42.09
情感支持得分	7.24(1.23)	7.40(1.23)	7.26(1.29)	7.30(1.28)	7.48(1.22)	7.32(1.25)
层2 变量						
队列						
1937~1941 年	22.86	24.10	27.40	31.76	37.06	26.84
1932~1936 年	22.01	24.25	26.03	26.41	29.37	24.76
1927~1931 年	14.71	16.37	17.81	18.56	17.13	16.53
1922~1926 年	26.63	24.77	21.43	19.08	13.99	22.73
1917~1921 年	9.73	8.03	5.97	3.40	1.75	6.82
1912~1916 年	4.07	2.48	1.37	0.78	0.70	2.32
女性	54.16	54.95	54.79	54.25	53.85	54.46
上过学	20.73	21.47	27.59	26.41	25.87	23.59
样本量(个)	1645	1332	1022	765	572	5336

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人一年”总样本指各期样本合并成一个样本集合。

### (三) 样本描述

从表 2 可以看出,由各期被调查者组成的“人一年”样本集合中,在心理福利测量方面,抑郁得分从 2001 年的 15.43(SD=3.91)上升到 2012 年 15.66(SD=3.82),“人一年”样本集合的平均抑郁得分为 15.50(SD=3.93);“人一年”样本集合的平均生活满意度得分为 13.05(SD=2.24)。没有子女迁移的老年人比例由 2001 年的 18.18%下降到 2012 年的 13.64%,而全部子女都迁移的老年人比例由 2001 年的 13.25%上升到 2012 年的 21.50%,有部分子女迁移的老年人比例则在调查期间略有下降。

有配偶的老年人占比从 2001 年的 56.41%下降到 2012 年的 48.43%;与子女同住的比

例从 1/3 下降到 1/4; 而老年人的功能状况变化相对稳定,“人一年”样本集合的生活自理能力平均得分为 16.73(SD=2.54)。在代际支持方面,绝大多数老年人得到子女的经济支持(样本集合中占比为 95.82%),不过调查期间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比例略有下降(从 2001 年的 97.20%到 2012 年的 91.78%); 而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的比例则由 2001 年 41.52%下降到 2012 年 16.78%。与子女有生活照料交换的老年人的比例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获得生活照料的老年人的比例从 57.20%下降到 29.90%,向子女提供生活照料的老年人的比例从 44.32%下降到 22.90%; 代际间情感亲密程度得分由 2001 年的 7.24(SD=1.23)上升到 2012 年的 7.48(SD=1.22),老年人和子女情感交流水平比较高。另外,“人一年”样本集合的平均年龄为 74 岁(SD=7.24),约一半样本老人处于 1932~1941 年出生队列(2001 年基线调查时 60~69 岁),但由于不同年龄死亡率的差异,样本中较晚出生队列的老年人比例越来越大,而较早出生队列的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小。

表 3 显示,老年人的抑郁( $F=3.43, P=0.008$ )和生活满意度( $F=3.29, P=0.011$ )在不同调查期均存在显著差异; 不过从调查期间的变化趋势来看,只有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在调查的 12 年间有恶化的趋势,生活满意度则没有明显的变化。进一步比较子女迁移状况不同的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差异,我们发现除了无子女迁移的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在不同调查期间有显著差异

表 3 各调查期老年人心理福利方差分析

	年 份					F 值	P 值
	2001	2003	2006	2009	2012		
抑郁							
样本总体	15.43	15.25	15.82	15.56	15.66	3.43	0.008
无子女外出	16.13	15.68	16.95	16.58	16.60	2.96	0.019
部分子女外出	15.35	15.18	15.64	15.50	15.66	2.10	0.078
全部子女外出	14.85	15.22	15.36	14.73	15.06	0.73	0.571
生活满意度							
样本总体	13.04	13.18	13.01	12.83	13.15	3.29	0.011
无子女外出	12.84	12.91	12.77	12.34	13.00	1.60	0.172
部分子女外出	13.07	13.28	13.05	12.82	13.16	3.57	0.007
全部子女外出	13.17	13.05	13.10	13.33	13.22	0.39	0.815
样本量	1645	1332	1022	765	572		

异( $F=2.96, P=0.019$ ), 部分子女迁移和全部子女迁移的老年人调查期内的抑郁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在生活满意度方面,只有部分子女迁移的老年人在各调查期之间有显著差异( $F=3.57, P=0.007$ ); 但也未呈现明显的单调变化趋势。上述结果说明,要分析和确定调查期内与时间有关的老年心理福利水平的变化趋势需要回归分析的检验以进一步解释相关影响因素。

#### 四、子女迁移对老年人心理福利影响的结果分析

##### (一) 子女迁移对老年人抑郁影响的回归结果

为检验子女迁移对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影响,我们分别建立年龄、年龄平方、子女迁移等变量对老年人抑郁和生活满意度影响的个体增长模型(见表 4)。

表 4 中模型 1 显示,年龄和年龄平方与老年人抑郁水平正相关(分别为 $\beta=0.061$ 和 $\beta=$

0.002),即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加速恶化。加入子女迁移变量后,迁移效应模型2显示,与没有子女迁移的老人相比,有部分子女迁移( $\beta=-0.392$ )和全部子女迁移( $\beta=-0.422$ )的老年人抑郁水平较低,子女迁移对老年人心理福利有积极影响。在控制了老年父母的社会人口特征、功能健康状况及代际支持等变量之后的交互

表4 子女迁移对老年父母心理福利影响的个体增长模型(N=5336)

变 量	抑 郁			生活满意度		
	年龄效应	迁移效应	交互效应	年龄效应	迁移效应	交互效应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固定效应						
截距	14.207***	14.564***	28.896***	13.325***	13.171***	6.066***
队列 <sup>a</sup>			0.456*			-0.252*
年龄	0.061*	0.060*	-0.078*	-0.002	-0.001	0.081**
年龄×队列			-0.025*			0.014*
年龄平方	0.002*	0.002*	0.004*	-0.001*	-0.001*	-0.003*
子女迁移状况(无)						
部分子女迁移		-0.392*	-1.125**		0.158	0.653**
全部子女迁移		-0.422*	-1.420**		0.212*	1.053***
年龄×部分子女迁移			0.047*			-0.029*
年龄×全部子女迁移			0.086**			-0.065***
女性 <sup>a</sup> (男性)			0.762***			-0.225**
上过学 <sup>a</sup> (未上过学)			-0.217			0.063
有配偶(无配偶)			-0.572***			0.096
与子女同住(其他)			-0.394**			0.270***
功能状况			-0.400***			0.166***
获得经济支持(无)			0.010			-0.021
提供经济支持(无)			-0.516***			0.264***
获得生活照料(无)			0.254*			0.017
提供生活照料(无)			-0.270**			0.023
情感支持			-0.799***			0.460***
随机效应						
层 2:截距	2.196***	2.190***	1.432***	1.047**	1.045**	0.822**
层 2:线性增长斜率	0.065***	0.066***	0.041**	0.028**	0.029**	0.023*
层 1:个体内	3.194	3.194	3.044	1.873	1.873	1.810
-2LL	14504.58	14503.16	14005.08	11620.33	11621.42	11302.70

注:括号内为参照组;a 为层 2 变量,其他均为层 1 变量;+p<0.1;\*p<0.05;\*\*p<0.01;\*\*\*p<0.001。

效应模型3显示,年龄与抑郁水平负相关( $\beta=-0.078$ ),而年龄平方与抑郁水平正相关( $\beta=0.004$ ),即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变化由下降转为上升,且上升速度加快。较早出生队列的老年人抑郁水平较高( $\beta=0.456$ ),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队列的正向效应不断减弱( $\beta=-0.025$ )。虽然有部分子女迁移( $\beta=-1.125$ )或全部子女迁移( $\beta=-1.420$ )的老年人比无子女迁移的老年人抑郁水平更低,但这种积极影响作用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弱(分别为 $\beta=0.047$ 和 $\beta=0.086$ ),比较二者系数,结果支持研究假设1和假设2。

我们基于模型3的估计结果,按照不同的子女迁移状况预测了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发展

轨迹(见图1)。对于无子女迁移的老年人来说,其抑郁水平随年龄增长经历了先下降再上升的非线性变化过程,这一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3。在低龄和中龄老年阶段,有子女迁移的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低于无子女迁移的老年人;但随着年龄增长,进入高龄阶段后,有部分子女迁移(85岁以后)和全部子女迁移(75岁以后)的老年人抑郁水平高于无子女迁移的老年人。尤其是全部子女迁移的老年人,虽然其抑郁症状的起始水平较低,但抑郁水平上升的速度更快。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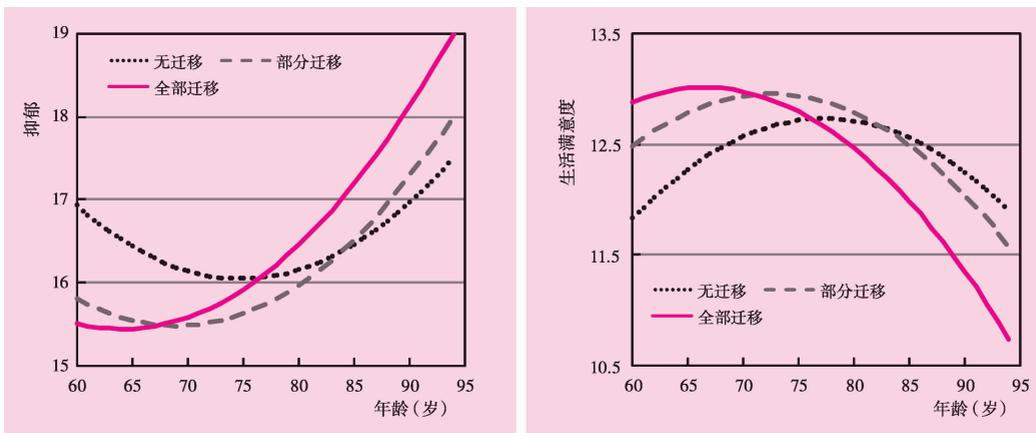


图1 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发展轨迹

考虑队列效应,图2抑郁曲线显示,在低龄老年阶段,全部子女迁移的老年人比部分子女迁移的老年人抑郁状况更好,但随年龄增长前者的抑郁水平上升更加陡峭,在中高龄阶段全部子女迁移的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更高。另外,在低龄老年阶段处于相同年龄时,较晚出生队列的老年人的抑郁水平较低;而在高龄阶段,较晚出生队列的老年人的抑郁水平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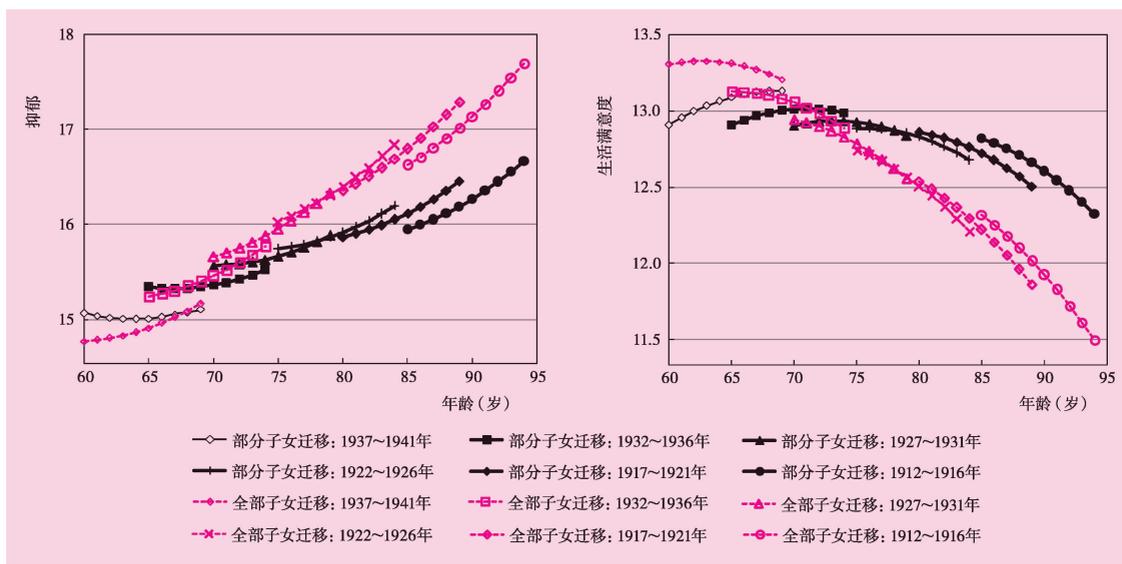


图2 不同子女迁移状况的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发展轨迹

## （二）子女迁移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在生活满意度方面,控制了老年人特征变量之后,交互效应模型 6 显示(见表 4),生活满意度与老人年龄正相关( $\beta=0.081$ ),但随着年龄增长加速下降( $\beta=-0.003$ ),这一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 3。老年人出生队列与其生活满意度负相关( $\beta=-0.252$ ),但这种负相关关系随年龄增长不断减弱( $\beta=0.014$ )。有部分子女迁移( $\beta=0.653$ )和全部子女迁移( $\beta=1.053$ )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均显著高于无子女迁移的老年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子女迁移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趋于减弱(分别为  $\beta=-0.029$  和  $\beta=-0.065$ ),比较二者的系数,结果同样支持研究假设 1 和假设 2。

图 1 显示,与抑郁水平相似,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随年龄增长呈非线性变化。在中低龄老年阶段,有子女迁移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好于无子女迁移的老年人;但是在高龄阶段,有部分子女迁移(85 岁以后)和全部子女迁移(75 岁以后)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较差;且后者与无子女迁移的老年人差距更大。进一步考虑队列效应,图 2 生活满意度曲线显示,在低龄老年阶段不论部分子女迁移的老年人,还是全部子女迁移的老年人,处于相同年龄时,较晚出生队列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更高;但在高龄老年阶段,较晚出生队列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处于明显劣势。而且在低龄老年阶段,全部子女迁移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比部分子女迁移的老年人更好,但是前者的生活满意度下降更快;中高龄老年阶段以后,部分子女迁移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反而比全部子女迁移的老年人更高,这从侧面说明了有本地子女对老年人的心理福利状况下降有保护作用。上述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 4。

## 五、结 论

本研究基于安徽巢湖 12 年纵贯调查数据,采用个体增长模型研究中国农村地区成年子女迁移对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影响。得到以下研究发现。

第一,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人心理福利有消极影响,而有子女在本地会起保护作用。与中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相同,巢湖农村地区的养老机构很少,子女赡养是当地主要的养老方式,而子女迁移可能造成养老资源不足。与子女迁移给留守老年人带来明显的经济增益不同,老年人个体经历的子女迁移这一压力事件对其心理福利有应激性。在考察迁移主效应时,我们发现子女迁移对老年人心理福利有积极影响;但进一步控制老年人的特征和需求变量则发现处于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需求的老年人对这一压力事件的反应存在差异。有子女在本地对老年人的心理福利下降有保护作用,特别是老年人年龄越大,越需要子女的帮助支持。

第二,农村老年人心理福利随年龄增长呈非线性发展。与研究假设一致,研究结果发现在低龄阶段老年人心理福利呈一定程度的平缓上升,到中高龄老年阶段之后心理福利下降明显加快。我们也注意到研究心理福利发展过程时应采用纵贯数据将年龄效应和队列效应区分开来的必要性,虽然在低龄阶段较晚出生队列的老年人比较早出生队列的老年人的心理福利更好,但在高龄阶段则相反。这可能是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农村社会经济经历了

史无前例的变革,低龄老年人曾在这一时期作为主要的生产劳动力,即使进入老年阶段,他们仍然相对健康,尚有劳动能力,也有代际交换资源,心理福利状况有一定改善。另外,巢湖农村地区各项社会保障尚未健全,高龄老年人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其心理福利面临更大风险。

第三,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影响依赖于年龄和队列效应。与研究假设相一致,在高龄老年阶段,有子女迁移、特别是全部子女迁移的老年人比无子女迁移的老年人心理福利下降更快。这可能是由于子女迁移对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自身的需求,老年人在低龄阶段身体状况较好、对子女照料和帮助需求不高,子女迁移更多给其老年父母带来经济上的回报(汇款)和心理上的荣耀(“光宗耀祖”);而到中高年龄阶段,老人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下降需要依赖子女的照料和赡养时,子女不在身边往往意味着可及性养老资源减少,会对老年人造成压力和不利影响。一旦老人因衰老或病痛需要子女照料时,照料资源缺乏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凸显出来,特别是子女外出可能性更高的较晚出生队列老年人会面临更大风险。

上述发现揭示了老年阶段的健康福利状况变化发展的复杂性,老年人并非是一个同质的整体,需要从个体和家庭生命历程视角进行深入探索。尤其是到21世纪中叶,高龄老年人的比例和绝对数量将迅速增加,在制定和实施老年政策时,应当关注农村老年人终生累积的福利劣势,根据不同生命周期和家庭周期的特点,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特别是针对大规模乡城迁移对农村老年人的不利影响,在城市化进程中应对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推动“离土不离乡”及返乡创业,进而惠及其不离乡土的老年父母。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子女距离等迁移的结构因素对老年人的健康福利后果有影响;由于研究对象是老年人,测量局限性使本文无法讨论迁移结构的影响。其次,农村传统的“男娶女嫁”婚姻制度下女儿可能外嫁到本县以外,而儿子则更多地因为工作性原因迁移,迁移原因的性别差异可能对老年人福利有不同的影响;由于测量局限,研究未能区分子女在各调查间隔期间外出的原因。再次,以往研究发现老年人自身需求等因素在子女迁移对老年人心理福利影响中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但限于本研究的重点未进行专门讨论,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 参考文献:

1. 杜鹏等(2004):《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人口研究》,第6期。
2. 梁樱(2013):《心理健康的社会学视角——心理健康社会学综述》,《社会学研究》,第2期。
3. Raudenbush, S. and Bryk, A. (2007):《分层线性模型:应用与数据分析方法》,郭志刚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 宋璐、李树苗(2008):《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分工的影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5. 张春林等(2013):《农村壮族留守老人心理健康状况研究进展》,《中国老年学杂志》,第11期。
6. Aboderin, I. (2004), Modernisation and Ageing Theory Revisited: Current Explanations of Recent Developing World and Historical Western Shifts in Material Family Support for Older People. *Aging and Society*. 24, 29-50.

7. Baldock, C.V. (2000), Migrants and Their Parents: Caregiving from a Distanc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1(2), 205–224.
8. Biao, X. (2006), How Far are the Left-behind Left Behind? A Preliminary Study in Rural China.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3(3), 179–191.
9. Blazer, D., Burchett, B., Service, C. and George, L.K. (1991), The Association of Age and Depression among the Elderly: An Epidemiologic Exploration.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6(6), 210–215.
10. Castles, S. (1998), New Mi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 Force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0, 215–227.
11. Diener, E., Emmons, R.A., Larsen, R.J. and Griffin, S. (1985),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9, 71–75.
12. Greenwell, L. and Bengston, V.L. (1997), Geographic Distance and Contact between Middle-Aged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The Effects of Social Class over 20 Year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52(1), S13–S26.
13. Holmes, T.H. and Rahe, R.H. (1967), The 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11, 213–218.
14. Kaplan, H.B. (1996), Perspectives on Psychosocial Stress. In *Psychosocial Stress: Perspectives on Structure, Theory, Life-Course, and Methods*. H. B. Kaplan (Ed.).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15. Katz, S., Ford, A.B., Moskowitz, R.W., Jackson, B.A. and Jaffe, M.W. (1963), Studies of Illness in the Aged, the Index of ADL: A Standardized Measure of B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Func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85, 914–919.
16. Knodel, J. and Saengtienchai, C. (2007), Rural Parents with Urban Children: So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Migration for the Rural Elderly in Thailand.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3(3), 193–210.
17. Massey, D.S. and Espinosa, K. (1997), What's Driving Mexico-US Migration: A Theoretical, Empirical and Policy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939–999.
18. Miltiades, H.B. (2002),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 of an Adult Child's Emigration on Non-Immigrant Asian Indian Elderly Parent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17, 33–55.
19. Qin, M., Punpuing, S., Guest, P. and Prasartkul, P. (2008), Labour Migration and Change in Older People's Living Arrangements: The Case of Kanchanaburi Demographic Surveillance System (KDSS), Thailand.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4, 419–432.
20. Radloff, L. (1977), The CES-D Scale: A Self-Report Depression Scale for Research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 385–401.
21. Secondi, G. (1997), Private Monetary Transfers in Rural China: Are Families Altruistic?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3, 487–511.
22. Silverstein, M., Cong, Z. and Li, S. (2006),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people in Rural China: Consequences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1(5), S256–S266.
23. Stark, O. and Bloom, D.E. (1985),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173–178.

(责任编辑:朱 萍)